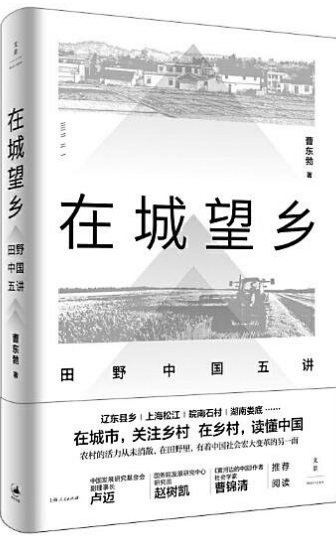


在田野中触摸乡村的脉搏

禾 刀

提示 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问题,是关系中国发展质量的重要命题。《在城望乡》从“现状”与“历史”“土地”“治理”与“出路”着眼,抛开就农村论农村的一元化解读模式,通过多年实地调研与学术研究,努力探寻当代中国城乡格局的变迁与农村发展问题的现状,试图将城乡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解开城乡协调发展的密码。在见证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同时,本书带领读者认识一个充满活力的农村,进而在真正的田野中触摸当代中国的脉搏。



“他是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地卷入到乡村研究领域中。”正是这样的特殊身份,构成了曹东勃的研究视角基调。作为一名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厚情感的年轻学者,曹东勃长期聚焦并致力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多次带领学生深入上海市郊、东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这让人似乎看到费孝通的某些遗风。

在《在城望乡》中,曹东勃回顾了新中国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基本脉络,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又以解剖麻雀的方式,逼近观察并分析了离乡务农的“农民农”(外地农民去大城市承包土地继续当农民)、土地开发、社区治理,以及家庭农场等农业创新现象。当然,仅凭一本书试图解答中国农村所有问题不太现实,但曹东勃扎实研究学术确实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线索,对于出身于农村的笔者来说,在倍感亲切之中又似乎看到了许多曙光。

曹东勃写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小岗村十八个红手印掀开了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序幕。小岗村的突破,本质上是农村地权政策的破茧,即打破了农村耕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间的坚冰。随着承包制的推广,长期困扰农村的温饱问题,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渐获解决。

紧随其后的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兴旺曾一度让人看到农村快速崛起的希望。但这种模式很快遇到了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诸多瓶颈的掣肘,单纯的低劳动力成本,并不足以

为乡镇企业更高发展提供更为持

久的发展动力。这同时意味着,走“粗放的工业+农业”混搭模式不太可能推而广之,毕竟市场总是逐利而生。

从农村出走,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打工,自然成为后来众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明智选择,至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数高达2.9亿。农民工的社会性流动,初期虽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但最终还是推动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解冻。当个性化利益驱动渗透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时,农村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便不再掩饰。先富起来的人先是搬到镇上,再到县城,脱离农村身份和生活是许多农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许多农民一旦手头阔绰,便会像城里人那样盖楼房,模仿城里人的生活点滴。

事实上,摆在外务工农民眼前的除了收入问题,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归属感,这一矛盾在“农民工二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与父辈半路“洗脚进城”不同,他们从小便生活在城里,除了户籍区别,他们的日常与城里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别。但在父辈心底,打工终究是一种临时性的谋生,故乡才是自己的归宿。

城乡二元户籍破冰,无疑有助于打破农民工的身份枷锁,至少有助于“农二代”城市归属感的建立。作者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农民增收有限,对农民归属感问题关注有限,让人略感遗憾。

所有的乡愁都是因为馋。馋,某种意义上正是过去农村物

资匮乏的写照。

作者聚焦上海城郊外地农民承包当地农民土地,用于种植瓜果蔬菜的现象,称这一群体为“农

民农”。与其他务工人员不同,“农民农”虽然离开家乡,但仍旧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作。“农民农”现象本质上是经济梯次发展的合理写照。不过“农民农”仅仅局限于城乡接合部,对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参照意义有限。

借助机械化实现规模化种植,这是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除了地广人稀的东北平原等少数地区,我国农村普遍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均较差,因此,在人口密集地区,通过机械化的规模种植实现收入增长的路径并不平坦。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将粮食安全作为底线,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近年来,在城市发展土地供给需求旺盛前提下,中东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洗脚上楼”举措。此举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工业土地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也给“上楼”后的农民带来了诸多不便,毕竟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稳农业就是赋予一定的地权,这是中华大地亘古不变的“真理”。农村土地流转是曹东勃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流转直面农民失地风险,所以至今仍只能小心翼翼地试验。

关于农村发展,曹东勃提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呼吁企业家下乡。富裕的农村,大都有一批出色的企业家。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农村生产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农民手头虽并不宽裕,但也不至于出现温饱问题。如果没有新一轮立足农村、善于团结更多农民的企业家的出现,更多人只能寄望于外出务工实现收入增长。

农村发展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曹东勃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个熟人社会,那么在农村地区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大多数农村是族系聚居或姓氏聚居,一个自然村往往是一个族系或同一姓氏。

曹东勃对重点考察的上海松江家庭农场给予了足够关注。近年来,类似松江这样,紧邻大中城市周边的家庭农场、休闲农场确实有如雨后春笋,也为当地农村带来了许多新兴希望。但由于土地承包期限等问题,急功近利的投资问题仍旧比较突出。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并非没有前提,那就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相对较好,方便城里人周末游。相较而言,远离都市的农村受制于距离,还有交通条件等问题,几无照搬此类模式的可能性。

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无论在乡望城还是在城望乡,这样的换位思考都很重要,不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发展决不能照搬城市发展的工商模式。曹东勃的研究虽然提供了有益探索,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农村地区现状各异,无论是作物种植还是地理条件千差万别。

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是政策红线,也是我们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底线、社会稳定红线。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有必要释放土地更多红利,让土地利用开发短线变长线,变一枝独秀为百花齐放。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或在于此,大力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这又回到曹东勃前面的话题,就是变企业家下乡为孵化农民企业家。

陶渊明的为父之心

邝海炎

编辑约我评一下钱志熙的《陶渊明经纬》,我爽快答应了,因为之前看过他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印象很好。一般人研究陶渊明只是围着陶渊明打转,钱志熙却对上游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了然于胸后再研究陶渊明,颇似曾国藩从武汉坐战舰下安庆围南京,深耕厚植,顺流而下,也就势如破竹。但读完《陶渊明经纬》,我有些失望,此书“义理篇”还不错,我感兴趣的“辞章篇”却比较弱,缺乏文本细读。也就只能呵呵,不知道写什么。

说到文人拖累孩子,我一下子想到两个人。一个是王国维,他因为学术而名满天下,但他深知生活之艰辛,把“学以谋生”放在首位,不准孩子当文人,亲自指导三个儿子考“公务员”,老人在海关,老二在邮政,老三在铁路,后来老二(王高明)没听父亲的话,半路出家,从邮政转为学术,不幸被王国维言中了,历经坎坷,最终和其父一样,自杀身亡。(参见陈鸿祥《王

国维全传》)

另一个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般人觉得陶诗闲适,“隐逸诗人之宗”,给人很仙的感觉。比如,那首著名的《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且”字多婉妙啊!儿女都跟“二货”一样,还不如慢慢喝我的酒吧!

可陶渊明真的超脱吗?摇摇摆摆后,陶渊明作出了辞官归隐的抉择。后人往往据此赞扬他高风亮节,却忽略了此决定导致的家庭经济困境,尤其是给5个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吃饱肚子,陶渊明有时觊觎向邻人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王维批评道,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如果能稍稍委屈一下自己,就足以

“安食公田数顷”,何至沦落于斯?《《与魏居士书》》所言自属人之常情,并非求全责备。再看《咏贫士七首》,“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看着哭泣无助的妻子,心意已决的丈夫或许还可以隐忍自持,可是一旦面对饥寒交迫的孩子,当父亲的就不能不为此深感茫然焦虑。这种隐痛在陶渊明晚年写给孩子们的《与子俨等疏》中表达得更直接,“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僂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父母总想竭尽所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可狷介的性格令陶渊明无法与世俗周旋,也让懵懂的孩子平白遭受牵累,“所以当他回想起孩子们在童年时所经历的诸多艰辛时,就不由自主地深切自责……”(杨燕《陶渊明的孩子们》)这才是最本色的陶渊明,我们不能只

看到他“仙”的一面,还要体味他的“拙”和“灼”。“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表面上虽诙谐,骨子里却极沉痛严肃。”(朱光潜语)

毕竟,把家人当作人的人,才有可能把旁人当作人。陶渊明是否也有类似残缺呢?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当了彭泽令后,派了一个仆人回家,帮自己的儿子干活。去信说:“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意思是,你自己干活很辛苦,我派了个劳力给你,帮你砍柴挑水。但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要好好对他。这就是“临人而有父母之心”(黄庭坚语),陶渊明的人性自然饱满,健康着啊!

总之,陶渊明是“乐道至苦”,他的闲适是从忧勤中得来,他的静穆也是从激烈中得来,是维特根斯坦欣赏的“经过后天努力抗争的单纯和才华”。

唐代都城周边的乡村社会

曲 宏

提示 历史学家把唐朝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首都,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徐畅在《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里,却没有以都城长安为研究对象,而是另辟蹊径,将长安周边广袤的乡村,作为“长安学”的另类作品着重考察。唐代京畿即首都圈里的乡村居民有怎样的生活样貌?那时的乡村社会是否自由富足?人们是怎样依附于近在咫尺的都城?这种研究盛世乡村的新视角,丰富了既有的研究范畴,又将以往唐朝研究中所遮蔽的盲区呈现出来,让唐朝首都圈的研究更为“丰满”。

京畿地域社会纳入长安城都市生活圈来研究,也因此开拓了长安研究的新视野。“京畿”一词出现于中国唐朝前,汉潘勗《册魏公九锡文》有“遂建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意即“位于国之中央的都城”。因唐时有“千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五为保”,本书的“京畿乡村”,包括万年、长安两京县、诸畿县,乃至近辅州辖区散布的乡、里、村,这些与长安构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这种整体意识是贯穿全书的。

如果说“长安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即通过对长安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复原历史原貌,深度解读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形成的历史,那么,长安京畿这一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就应是唐朝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显然,任何都城都不能没有乡村的支撑。幸运的是,关于唐朝这一地区的史料相对多一些,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大量碑志的出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可以深入的可能。徐畅在汇集传统文献、石刻资料、考古文物乃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记载,在零碎而不系统的史料里爬梳,唐代京畿地区户口统计、行政层级以及各类阶层人物角色扮演等方面逐渐规整,无疑填补

了相关研究空白。

陈寅恪研究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看历史的聚焦点始终都是在“人”的身上,他的历史世界的主角,是中古士大夫,是活生生的人物、人格,而非事件、制度、结构。徐畅在考察长安京畿乡村的历史时,也是以人为本,其最初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京畿地区辅恒的一方墓志。辅恒祖上曾在隋朝出任,但他这一代是农人身份,43岁时因为建陵义役有功而救得将仕郎,由农人的身份转而进入内官行列。这名农人别样人生都是发生在唐朝前期的京畿这一特定时空。这位有代表性的小人物的人生历程,成为思考京畿地域社会特质的样本,也成为京畿乡村社会史研究方向的发轫。

如果要选择一名唐代文人官员,借助他的生活轨迹和作品来了解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状态,白居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徐畅透过典型人物白居易的眼睛来透视京畿乡村生活,这是她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白居易并非出生在长安,进士及第前没有大都市生活经验,他在长安近郊任过县尉,在转变为长安居民过程中,对长安的感受和认知,较本地人用心。在周边小县的经历,对乡村世界的体会,更贴近民众生活实际。他看到的麦收

季节勤劳农家的劳作场景特别生动:“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随田去,丁壮在南冈。”大旱时,农事的艰难在他的诗中是,“回看归路傍,禾黍尽枯焦”,于是他叹息“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这些无不体现当时京畿乡村生产情况和民生艰难。而他所处的时代也正好是社会变革萌芽之时,两税法率先在京畿试行,京畿民众的税收负担沉重,因此白居易在《赠友五首》中提及:“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殫。”通过白居易的视角,通过他的讽喻诗,从哪个角度看,对9世纪的唐朝城乡经济的描述都是最贴切,也是最近距离的了。而透过白居易的眼睛,徐畅看到的是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的深处。

怎样把历史资料用活,作者采用数字技术进行了新尝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无疑要涉猎更多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这些主题无法依赖传统的经典和精英文献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的张广达提出,以往研究唐代社会缺少对下层社会的考察,对人数众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百姓着墨甚少。这一情况很多是由于缺少材料造成的。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唐代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究竟是人不敷出,是收支相抵,还是有所盈余,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作者在试图描摹乡

村农人的家计与生活时,借助“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和其他资料,用数字化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京畿五口小农家庭模型。这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京畿乡村家庭,有茅屋三四间,可能与他们两家共有一头耕牛,种植着粟、麦,家中女子以桑麻纺织为主要营生,此外也许还有园艺、养殖或种植蔬菜、瓜果的收入,全家一年在扣除赋税、口粮、食盐、衣物和其他农具、种子等支出后,还能有一定的盈余。这种模型勾画出京畿乡村农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图景,这也与历史学家毛汉光对唐代西北农民家庭的考察结论相类似。显然,新技术给作者的研究提供了支撑。

尽管难以复原,历史学家还是要有意识地调整观察视角,去追求历史的真实,哪怕是创造的真实当中,也可以一步一步接近真实。《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不仅对京畿乡村社会的变迁进行了系统分析,而且把立足这片土地上的各类人群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以人为主体的互动关系,发现过往生活的实际问题,将现象、概念、解释连成一个逻辑链条,探索京畿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尽可能地复原了大唐王朝盛世京畿乡村的生活图景。

■聊书

呼喊与细语

丁春凌

《莫忘我》

这本书比我想象的小,比估计的沉。作为老龄社会观察笔记,《莫忘我》行文细致、感性。作者汤玲玲,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博士,供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书里的61篇文章,多数是她对新加坡和日本两个老龄社会群体的深描。

在新加坡超过60岁的老人被称为“乐龄人士”,汤玲玲笔下的很多高龄老人有着还算不消极的生活态度,比如年过八十了还爬上梯子去修屋顶的退休教授,83岁成功申请到博士奖学金的科学家。这让我想起《秋园》的作者杨木芬,一生都不是个反叛者,却在60岁拿起笔,用写作对抗虚无。

老龄社会不得不劈面直视的各种沉重话题,也在书中一一呈现。比如,子女跨国看护老人的艰辛、失智病人的困窘、独居老者最后的离场……老去,是每个人滑不过去的章节。汤玲玲的呼喊与细语里,没有立孝顺或爱的flag,因为,光有这些远远不够;没有故作勇敢,没有妄图略去老年时的诸般无助,更没有用优雅的告别去煽情,而是告诉大家,这一路上,将要面对什么。

谁不曾是、正是或将是所爱之人的照护者呢?对了,看完《莫忘我》,我又买了本《我还记得》,讲述姐妹仁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的书,看了看。

还没完。

最后,我还投屏看了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是那个“汉尼拔”霍普金斯演的。

《饮食西游记》

写饮食的,通常分两类。一类是教你怎么做菜,像教程一样;另一类是饮食杂文,食物只作为一个切入,宕开后,写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情感、历史、文化等。

周松芳的这本《饮食西游记》就属于第二类——粤菜在海外的流传。

再会吃,如今谁会知道1900年的菜到底什么味道?更何况古代的?

在书里,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历史,围绕李鸿章、梁启超、胡适、赵元任夫妇、朱自清等,在海外的就餐经历,吃喝喜好等,讲述各界名流和海外中餐馆的有意思的机缘。

看得我只想吃什么左宗鸡、过桥蕨鲜鱼、豆奶冻、橄榄榛子……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收录的是索尔·贝娄最知名的散文,又精选了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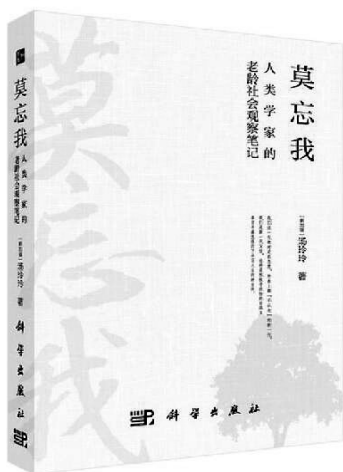
有些人对索尔·贝娄不熟悉。他是犹太人,美国作家,1953年凭借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一举成名。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中,贝娄写海明威,写契弗,写他的伊利诺伊游记,泛着淡淡的幽默。即使在自己最负盛名的时刻,你从他的文字里,也看不出姿态感。无论写书评、影评,还是现场演讲,贝娄总是情绪稳定,清醒而不沉陷,道德又不自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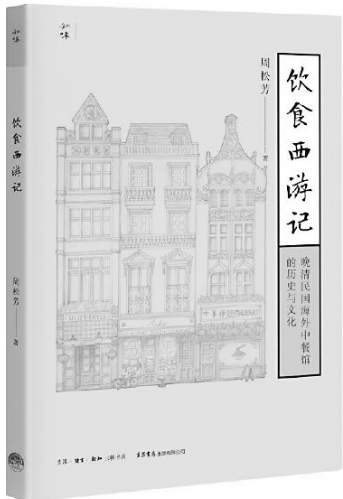
对了,契弗是个酒鬼,厉害的是,还活过了70岁,这个早前我知道,看了贝娄写契弗,我又八卦到一个细节,契弗还曾经到监狱教囚犯写作。这简直太有意思了。估计,狱警期待,让囚犯记录自己的经历,有可能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柔软。

书,写得真好,翻译的也简洁优雅。少滑动一会儿手机吧,毕竟,这世界还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贝娄说,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依靠也挺好的。它迫使你转向内心,寻找真正持久的东西。

《莫忘我》



《饮食西游记》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